

明清时期畬汉两族人民的友好关系

蒋炳钊

关于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在当前学术界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在阶级社会里,民族之间的关系是不平等的,是剥削和压迫的关系;有的认为,历史上虽然存在有民族压迫和民族战争,各民族的统治阶级经常制造矛盾和民族隔阂,但从总的方面看,各民族的友好往来与相互融合是民族关系的主流,这表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联系的不密切和相互影响。我们支持后一种观点,不能简单地用阶级关系代替民族关系,过份强调民族矛盾和斗争的一面。现仅就明清时期畬汉两族人民关系的具体事实说明这个问题。

一

我国是一个由五十多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的国家。从很早的古代起,我国各族人民就劳动、生息和繁殖在中国这块广大的土地上,共同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结合成为伟大的中华民族。

畬族是一个有长久历史发展的民族。根据史书记载,至迟在公元七世纪初的隋唐之际,畬族的先民已经聚居在今闽、粤、赣三省交界的这一广大山区。唐初,唐王朝为了“靖边方”,派了陈政、陈元光父子率军进入这一地区,曾引起了当地人民的反抗。《云霄厅志》记载:“(唐高宗)总章二年(669年),泉、潮间蛮僚啸乱。”^[1]唐代所称的“蛮僚”,就是宋代在同一地区出现的“畬民”、“峯民”的祖先。

早在唐代,畬族地区的经济已有了一定的发展,唐王朝在公元六八六年(垂拱二年)和七三六年(开元二十四年)先后在畬族聚居的漳、汀地区设治^[2],开始对畬族人民进行封建的统治。

宋元时期,随着我国封建经济发展的同时,畬族内部已经出现了一些“酋长”和“有恒产”的剥削者。如宋代漳州“南畬三十余所酋长,各笈户口三十余家,愿为版笈民”^[3]。元初,在“畬军”中出现“有恒产”和“无恒产”两个对立阶级^[4]。这些“酋长”和“有恒产”者,他们同汉族的地主阶级互相勾结,或接收封建王朝的招抚,成为畬族内部的统治阶级。

沉重的封建徭役和赋税的剥削,迫使广大畬族人民到处迁徙。从史书的记载,现在聚居在闽东、浙南的畬族,他们是从广东潮州和福建汀、漳地区陆续迁徙来的。如明周华《游洋志》(民国版)记载,这时已有畬族移居兴化(今莆田)。闽清、古田、永泰等县的畬族也是在明代出现的。闽东的畬族,最早也是见于明万历年间谢肇淛《太姥山志》记载,他过湖

坪时，“值畚人纵火焚山，西风急甚，竹木迸爆霹雳，舆者犯烈焰而驰下山，回望十里为灰矣”，他目睹畚人在排种，并写下：“畚人烧草过春分”的诗句^[5]。闽东的福安县是现在畚族最多的一个县，早在清代，有畚族居住的村庄已有二百多个^[6]。其他如“福鼎、古田、连江、福宁、宁德、福安多有是种”^[7]，都有畚族分布。所以到清代，畚族已不再是“不隶版籍”、“不输租税”的“化外之民”了。浙江南部的畚族是从闽东几经辗转迁移过去的。畚族迁入浙江境内最早也是在明代，大量迁移则在清代^[8]。可见现在畚族的居住区是从明清时代开始形成的，它同历史上的聚居地已有明显的不同了。

畚族人口三十三万五千余人（1978年），其中福建省有十九万七千多人，主要分布在闽东宁德地区的十一个县内；浙江省有十三万余人，主要分布在温州、丽水、金华三个地区的十多个县内；江西有四千六百多人，分布在东部的铅山、贵溪两县和南部的兴国县；广东省有二千五百多人，分布在潮安、海丰、大埔、增城、惠阳、博罗等县；安徽省宁国县约一千多人。畚族分布在我国东南五省六十多个县市的部分山区。一般是几户至几十户聚居成村，周围是汉族的村落，也有的村落畚汉两族人民杂居在一起。这种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特点，大约自明清时期以来开始形成。这是畚族历史发展的一个特点。

这种分布的自然特点，决定了它与汉族的关系，形成一个密不可分的社会整体。畚汉人民的杂居，大大加速了畚族地区封建化的过程。在阶级社会里，畚族人民受到阶级、民族的双重压迫，但是经过长期发展起来的畚汉两族人民生息与共，患难相依的密切关系，这应是民族关系的主流，也是畚族历史发展上的一个最大的特点。

二

畚族地区古代社会经济的发展，除了内在的因素外，受汉族的影响是很大的。特别是从唐王朝在畚族地区设治开始。郡县的设置，客观上促进了畚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密切了畚、汉两族人民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关系。比如在未设治以前，“（汀州）州境五百里，山深林木秀茂，以领长汀、黄连（今宁化县）、杂（新）罗（今长汀县西南）三县。地多瘴疠……”^[9]。漳州地区“时境内尚多瘴雾蛇豕之毒”^[10]。“可耕乃火田之余，原始要终。……所事者搜狩为生”^[11]。“凡畚，帷种黍稷，皆火耨”^[12]。可见当时畚族人民所处环境是相当恶劣，农业生产水平低下，过着刀耕火耨和狩猎为生的生活。州县建立之后，汉族人民陆续移入这一地区，如陈元光请置漳州事谈到：“诏从之，乃率众辟地置屯，招徕流亡，营农积粟，通商惠工”^[13]。《临汀汇考》记载：“唐时初置汀州，徙内地民居之，而本土之苗，仍杂处其间，今汀人呼曰畚客。”^[14]从而使得这一地区由原来是“苗人（即指畚民——笔者）散处之乡”，逐渐改变为“民僚杂处”之地。随着汉族人民移居于此，汉族的先进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便随之传入，“于是负耒耜者，皆望九龙山而来。至贞元后，风土之见于诗者有曰山乡”^[15]。经过两族人民的辛勤垦殖，使得“林木阴翳，荆棘丛生”的荒地，“渐成村落，拓地千里。”这一艰苦的业绩，凝下了畚汉人民友好关系的结晶。“唐宋以来，民僚杂处无论矣。”^[16]畚汉杂居局面开始形成。

随着封建郡治的建立，汉族封建生产关系便推行到畚区。畚族社会经济的发展，直接受到汉族生产关系的影响，比如唐王朝设治后便强迫畚族人民缴纳赋税。昭宗乾宁年间（894—

898年),福建观察使王潮还派官吏到汀州畬族地区“劝农桑、定租税”^[17]。可见畬族人民已同汉族人民一样,身受封建官吏和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

宋元时期,随着我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汉族地主阶级和封建官吏随意霸占畬族农民的土地,进行敲诈勒索。在漳州畬族地区,汉族“贵家辟产,稍侵其疆,豪干诛货,稍笼其利,官吏又征求土物蜜蜡、虎革、猿皮之类”^[18]。畬族内部也出现有“酋长”和“有恒产”者等一些不劳而获的剥削者,其中有些人就是畬族内部的统治阶级。阶级分化相当明显。

明清时期,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迫使畬族人民不断迁徙,这个时期,中国地主经济已经相当发展,闽东和浙南都是汉族住居区,这一带的广大山林和土地,已大都为汉族地主阶级所占有。因此畬族每迁移一处,只能在荆棘丛生的山岳地带,依山坡,开荒造田,或向汉族地主租种土地,重建家园,定居下来。

畬族是由一个比较聚居的民族变为一个大分散小集中的散居民族。因而它与汉族的关系,彼此形成为一个密不可分的社会整体。畬族迁居到偏远的山区,自然条件差,所开垦的一点土地收入,除缴纳赋税,是不足维持生活的。因而广大畬民被迫要向汉族地主租种土地,沦为汉族地主的佃农。《处州府志》记载,浙江处州各地畬族“盖佃作之氓也。”《临汀汇考》记载:“观明时,汀州瑶(按:即畬族)弗靖,郡守吴文度设方略抚绥,畬即承赋如居民。”^[19]《建阳县志·余民风俗》记载:建阳县畬民“所耕田皆汉人业,岁纳租外,得赢余以自给。”《天下郡国利病书》也记载了明初福建畬民必须“量纳山赋,其赋论刀若干,出赋若干”的赋税剥削^[20]。明代迁至莆田的畬民,一开始就向汉族地主“租山耕植”,“垦山为业。”^[21]广东畬族地区,在明成化年间,潮州官吏杨显至此,“显至,建城廨,辟田莱,驱峯(畬)瑶,劝农桑,均赋税,兴学校”^[22]。不论新迁居的或是原来居住的畬族地区,其社会经济已同汉族结为一体。畬族人民同汉族人民一样,大都沦为汉族地主的佃户。同时,在汉族封建经济的冲击下,畬族内部阶级分化更明显了,据《宣平兰氏宗谱》记载,在明万历初年,浙江宣平县已有占地六、七十亩的兰姓畬族地主。

此外,在福建的一部分地区的畬民,还受到二地主——即“寮主”的剥削。据明代熊人霖《南荣集》记载:当时畬族地区有山主、寮主和菁民三种人,“山主者,土著有山之人,以其山俾寮主执之,而征其租者也。寮主者,汀之久居各邑山中,颇有资本,披寮蓬以待菁民之至,给所执之种,俾为锄植,而征其租者也。菁民者,一曰畬民,汀上杭之贫民也。每年数为百群,赤手至各邑,依寮主为活,而受其佣值,或春来冬去,或留过冬为长雇者也。”^[23]这种出卖劳动力,接受雇佣剥削,到了清代更为普遍。

经济上的联系还突出地表现在共同的经济市场上。由于畬族分散居住山区,决定了它不可能形成单独的民族市场。“近则附近民居各村,与民往来交易。”^[24]他们一般得到一二十里外的汉族城镇去交易。长期以来,畬汉人民形成了共同的经济市场,这就更进一步促进两族人民之间的经济往来和密切关系。畬族人民带到市场交易的一般都是当地的土特产,如“所树秧曰稜米,实大且长,美甘香;所产姜、薯、薏、豆、菰、笋品不一;所制竹器有筐篚;所收酿有蜂蜜;所畜有鱼豕鸡鹜,皆鬻于市”^[25]。“其人入城贸易,多竹器,蜂蜜及野兽山禽之类”^[26]。“或携瓠贮茶,以售于市”。山区盛产的木材、柴火、木炭更是畬民经常挑进城出售的货物。《临汀汇考》记载,清代朱国汉“绿蒲畬客饭,红叶女郎樵”的诗句,就是畬族妇女艰苦采薪的写照。“鬻薪入市廛”、“三、五女负薪鬻于市”,即指这类商品。他们

出售土特产后,又从市场上购进盐、布等日常生活必需品、铁制生产农具以及妇女衣饰上的各种料珠、丝绒线等。通过市场的交易,互通有无,这对沟通两族人民的经济往来,密切各方面的联系都起着重要作用。

三

经济上的密切关系,反映在政治上也是一样。从唐代开始,畬族人民同汉族人民都同样受到封建王朝的直接统治,深受封建地主、官吏的压迫和剥削。畬族是一个富有革命斗争传统的民族,在封建王朝残酷剥削的统治下,曾不间断地掀起反抗斗争。如史书上记载畬族活动最早的历史就是从反抗陈政、陈元光的斗争开始的;畬族的名称也是由于他们强烈反抗南宋统治阶级的斗争时出现的。刘克庄《漳州谕畬》一文就是为了镇压畬族人民的反抗斗争而出笼的。“畬人不堪,愬于郡弗省,遂怙众据险,剽掠省地”,“一城红巾满野,久戍不解,智勇俱困”。斗争规模巨大,屡败统治阶级的武力镇压。导致起义的原因连刘克庄本人也不得不承认:“余前所谓贵豪辟产诛货,官吏征求土物是也”^[27]。宋末元初,畬族起义军领袖陈吊眼、许夫人和黄华领导的抗元队伍,声势异常浩大。陈吊眼等领导的汀漳地区的起义军从一万多人发展到“聚众十万,连五十余寨,扼险自固”^[28]。闽北黄华领导的起义军有“众几十万”。起义队伍中组织起畬族武装“畬军”,提出“复宋”的口号为号召^[29]。畬族人民的反元斗争,在我国农民战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30]。历史上畬族人民大规模的起义斗争,都曾得到广大汉族人民的支持和参加,有的是畬汉两族人民共同联合进行的。共同的阶级地位,把两族人民紧紧拧在一起。

在明代以前,封建统治者对畬族地区的统治,一般还是利用畬族的酋长头人进行的,尚未设置官吏统治。因此在畬族聚居的广大地区里,封建统治者要完全控制它,还要有一个过程。所以还有一部分是统治阶级统治比较薄弱的地区。刘克庄《漳州谕畬》曾有这样的记载:

“二畬(指龙溪的西畬和漳浦的南畬)皆刀耕火耘,崖栖谷汲,如獐升鼠伏,有国者以不治治之。畬人不悦(役),畬田不税,其来久矣。”所谓“有国者以不治治之”,畬民“不役”、“不税”,并不是统治阶级对畬民发善心,而是他们统治的魔爪还不及的缘故。

到了明清时代,情况则有了不同了。因为这时畬族已经陆续迁徙到各地,分散同各地的汉族聚居在一起。统治阶级为了加强对畬族的统治,从明初开始在畬区设官统治。“国初设抚瑶土官,令抚绥之,量山纳赋”^[31]。这种“土官”或称“峯官”,就是封建王朝统治少数民族地区的基层政权形式,并通过它向畬民征税。后来又推行保甲制度,明正德年间,赣南畬汉人民曾掀起大规模的反抗斗争,明王朝派王守仁巡抚南赣,为监视和防范人民的不满和反抗,便开始设立保甲。在各府州县所属各乡村设保长,专一防御“盗贼”,如遇人民的反抗,由保长统率各甲截捕。“其法编十家为一牌,开列各户籍贯、姓名、年貌、行业,日轮一家,沿门按牌审察”^[32]。到了清代,保甲制度在畬族地区普遍推行,并实行“编图隶籍”,这比“土官”制又进了一步。如地方志记载,龙岩地区的畬族“许其编甲完粮,视土著之民一例。”德化县畬族“入清遵制编保甲,从力役,视平民无别。”南平地区畬族在“乾隆五年,编图隶籍。”不仅福建畬区是这样,浙江畬族地区也同样推行保甲制度,“今法十甲为一保,立一保正。十家为一牌,立一甲长,其畬民则编为寮民”^[33]。统治阶级已把畬族同当地

汉族一样编立保甲，设保正，甲长（畲族称寮长）进行统治。《兰氏宗谱》中曾记载畲族“兰世贤历任保长”的事。

此外，统治阶级为了加强对畲汉人民的统治，除设保甲外，还在各主要地区增设军事据点。福宁府“水陆营汛，棋布星罗”，全府共设一百五十三个塘汛^[34]。处州丽水县，雍正间设有二十多个塘汛^[35]。设塘汛的目的如福宁知府李拔所说：“塘汛之设，所以察奸宄，资守望”，“无事则往来巡缉，有事则联络声援”^[36]。使“山首峒丁略受约束。”可见，至明清时期，畲族人民已同汉族一样，在政治上完全处于被统治被奴役的地位。

四

随着畲汉两族人民在经济上、政治上的关系密切，促使原来畲族所固有的文化特征和生活习俗也发生了变化，同汉族共同性的东西愈来愈多。首先表现在语言方面，现在畲语中有很多词汇都与汉族客家语相近。罗香林说：“他们的语言几乎十之七八皆和客家相同”^[37]。有的地区如德化县畲族，却早已忘记了自己原来的语言，通用当地的汉语方言。目前畲族都会操当地汉语方言。畲族没有文字，通用汉文。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经济上的穷困，畲族文化很落后，直至清代，畲民“识字者绝少”^[38]。“无文字，其贸易商贾，刻木大小短长以为牒。”^[39]嘉庆八年（1803年），浙江巡抚阮文达会同学使文宁奏准畲民准予参加科举考试，但是统治阶级还规定了“照例自家不清白者”，如“作舆台、为人役身”等，仍不准应考^[40]。就使一些较富裕的畲族子弟要参加科举，也受到刁难。曾发生过福建福鼎县畲民钟良弼上书“呈控县书串通生监，诬指畲民不准与试”的事^[41]。在地主阶级统治的时代，广大劳动人民被剥夺学文化的权利。畲族文化起点低，读书人不多，但是已有一部分畲族子弟进汉族学堂读书并参加科举考试。据屠本仁《畲客三十韵》诗赋道：浙南地区“十县闻，畲客且千万，子弟秀而良，亦足备选择。字或识九千，弓可挽五石，以之充学堂。……令下郡县庠，五姓咸欢悵（兰、雷、钟、盆、娄五姓）”^[42]。有的还中了科举：“云邑（浙江云和）畲民援例求考，近亦列名黉序者矣。”^[43]“其散居温州者，于道光六年援例求考。”^[44]福建“连江深山曰畲民，其秀者亦读书与试云。”^[45]闽侯“近数十年来，（畲民）渐与土人同化，雷、兰二姓，间或侨居省城，且有捷乡会试登科第者”^[46]。江西畲民“初时不识字，今略能书，为纳租时记其数”^[47]。这反映出畲族知识分子在成长，有的还充当衙门的官吏，“畲民有读书者，入衙门充书吏”^[48]，“亦有入庠者，蒸蒸然染华风矣”^[49]。畲族知识分子一开始便接受汉族文化，这对促进本民族的汉化曾起过直接的推动作用。

长期以来，畲族均实行族内婚，本民族内部“自相匹偶”，不与汉族通婚。可是，随着畲汉人民的频繁接触和友好的往来，这种旧的习俗被打破了。它不仅同汉族有了通婚，本族内部同姓不婚也改变了，甚至嫁娶时衣服装饰也渐慕汉族了。《建阳县志》记载：“近惟嘉禾一带余（畲）民，半染华风，欲以汉人为婚，则先为其幼女缠足，稍长，令学针黹，坐闺中，不与习农事。奁资亦略如华人。……妻或无子亦娶妾，亦购华人田产，亦时作雀角争（打牌），亦读书识字，习举事业。嘉庆间有出应童子试者”^[50]。据调查，福建宁德县南岗丹斗村的畲民，他们在康熙年间，迁到这里居住，便同邻近的汉族有着密切的婚姻关系。解

放初期全村三十四户中,就有三十户是娶汉族姑娘为妻的⁽⁵¹⁾。浙江、广东等地畲族同汉族通婚也日渐增多。婚姻关系的变化,只有两族人民关系亲密无间才有可能达到的。

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畲族人民是受压迫、受歧视的,但是畲汉两族劳动人民世代相处,在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中,生息与共,患难相交,民族关系是友好的。上面谈到,两族间开始相互通婚,有的虽还不与汉族通婚,但喜欢同汉族互认“契子”、互拜“谊父”。“(畲民)最好结纳,例不得与土人结婚。惟乐为土人认谊父,俗谓称爹。土人亦以其子女善达,冀其庇荫,故多认之。相认之始,则祭其祖,先赐以保名,赠以花带,而为之螟蛉者,亦果得善达焉。虽世家大族,亦往往有之,习以为常,直呼之曰亲爹、亲娘,不足为怪也”⁽⁵²⁾。福鼎县浮柳乡的高厝里和兰厝里二村,是清代由汉族高姓和畲族兰姓迁居于此,共同开垦这一地区,他们祖辈亲如一家,一直到现在两村男女老少都是互称伯叔婶姆和兄弟姊妹,关系十分融洽。

在生活上相互帮助的事就更多了。畲族妇女穿戴的绣有各种美丽图案的衣饰,大都是汉族衣匠制作的。清代移居至霞浦县草岗村居住的畲族,得到浦后村汉族人民的帮助,拨给土地,帮助他们盖房子⁽⁵³⁾。过去,畲族的住房都是“编荻架茅”,后来在汉族帮助下营建瓦房。“屋以竹为盖,或编茅辑簣为之,间亦有用瓦者。”⁽⁵⁴⁾畲族地区的住房结构一般都和当地汉族相同。

畲族人民是非常好客的。节日互相访问,每当汉族及本族客人光临,都将受到盛情款待。“正月初旬,诣戚友家未至百步许,则声爆竹为号,为之主者必倍其数以应,多者恒至累千百。外人每闻其声震山谷,喧阗不绝,知余(畲)民之肃客也”⁽⁵⁵⁾。客人至,款以上饌,尤其是新鲜猎物。畲民长期与兽害作斗争,自幼锻炼出狩猎好本领。“虽幼小,能关弓药矢,不惧猛兽,盖其性也。”⁽⁵⁶⁾“精射猎,以药注弩矢,着禽兽立毙。供宾客,悉山雉、野鹿、狐、兔、鼠、蚓为数。豺豹虎兕间经其境,群相喜谓野菜,操弩矢往,不逾时,手拽以归”⁽⁵⁷⁾。

所谓“半染华风”,即说明畲族与汉族在生活习俗方面已日益接近。汉族人民中传统的各种节日和习俗也为畲族所接受,故畲族有许多节日都同汉族一样。畲族葬俗早期流行火葬,后亦改为土葬。“迩来与居民联婚,改其焚尸浮葬之习,亦足一道同风之化云”⁽⁵⁸⁾。“其习俗诚朴,与土著无异”⁽⁵⁸⁾。凡此种种,反映出民族间的差异性逐步在缩小,表现出畲族汉化的过程。

民族间的相互同化,这是历史上的进步现象,正如列宁所教导:我们“欢迎民族的任何同化,只要它不是借助于暴力或特权进行的”。“无产阶级不能赞同任何巩固民族主义的做法,相反地,它赞同一切帮助消除民族差别、打破民族壁垒的东西,赞同一切促使各民族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和促使各民族溶合的东西”。⁽⁶⁰⁾

综上所述,明清时期畲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诸方面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由于汉族的生产方式和文化对畲族起着愈来愈明显的促进作用。畲族人民除保留一些本民族固有的习俗和语言以外,其它诸如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都同当地汉族大致一样。从畲汉民族关系的发展所反映出来的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情况也大致是这样:一是各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早就形成了以汉族为中心,都同汉族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联系。在大多数民族中,尤其是散居民族,这种关系可以说达到了极其密切和不可分割的程度;另一方面,在阶级社会中,又长期存在着民族压迫制度,在多数情况下,是汉族统治

者对少数民族的压迫。虽然在阶级对抗和阶级压迫的社会,统治阶级对被统治的民族不可能有民族的平等,但是,正如列宁所说:“只要各个民族住在一个国家里,它们在经济上、法律上和生活习惯上便有千丝万缕的联系。”^[61]因而历史上我国各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联系不是如同现在在平等互助的基础上发展起来,而往往是经过民族斗争,反对民族的压迫,是经过流血斗争换取的,也是同当地汉族人民的支持分不开的。畬汉两族人民深厚的民族情谊和友好的关系正是通过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形成的。

民族间的相互同化,这是历史的必然现象,落后的民族必然要向先进的民族学习,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汉族在我国历史上不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诸方面都比较先进,形成我国多民族国家中一个人口最多的主体民族,在我国历史上曾起着主导作用。它的存在对我国其他民族的发展都产生过巨大影响和作用。畬族的社会历史发展也清楚地说明这一点。畬汉两族劳动人民在长期密切往来中所形成的友好民族关系始终是占主要地位,是历史发展的主流。

明清时期,畬族社会发展水平同汉族地区大致相同。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同样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因此,解放前夕畬族所处的社会性质同当地的汉族地区也是一样。所以,解放后实现各民族的平等,党在畬族地区采取的与当地汉族一起发动,同时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是符合畬汉人民共同的要求和愿望的,这也是历史上民族关系发展的结果。

注:

- (1) 嘉庆《云霄厅志》(民国版)卷十一,《唐宦绩》·陈政条。
- (2)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九,《江南道》五,漳州、汀州条。
- (3) [18] 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三,《漳州谕畬》。
- (4) 《元史》卷十三,《世祖本纪》。
- (5) 《太姥山志》卷中、卷下。
- (6) [7] 《福安县志》卷三,疆域。
- (8) 参阅徐规:《畬族名称、来源和迁徙》《杭州大学学报》1962年第2期。
- (9) 《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二,《江南东道》十四,汀州。
- (10) 《漳浦县志》卷十四,名宦,吕琦条。
- (11) 《云霄厅志》卷十七,陈元光《清建州县表》。
- (12) 《云霄厅志》卷十六,名迹,火田。
- (13) 《云霄厅志》卷十一,唐宦绩,陈元光条。
- (14) [19] 《临汀汇考》卷三,畬民。
- (15) 《临汀汇考》卷一,方域。
- (16) 《云霄厅志》卷八,兵防。
- (17) 《资治通鉴》卷二五九,唐纪七十五。
- (20) [31] 《天下郡国利病书》第十六册,福建,《防闽山寇议》。
- (21) 崇祯《兴化县志》(民国版)卷八。
- (22) 《潮州府志》卷三十三,宦绩。
- (23) 《南荣集》卷十二,防蕃议下。
- (24) 《古田县志》卷二十一,礼俗。
- (25) 《长汀县志》卷三十五,杂识,畬客,引范绍质《瑶民纪略》。
- (26) 《汀州府志》卷四十五,丛谈附。
- (27) 《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三。
- (28) 《元史》卷一六二,高兴传。
- (29) 郑所南:《铁函心史·元鞬攻日本败北歌并序》。
- (30) 参阅蒋炳钊:《畬族人民反抗元朝统治阶级的斗争》,《厦门大学学报》1963年第2期。

(下转第49页)

特别值得一提的，袁枚还留意搜集明末抗清志士的遗诗，表彰他们的事迹。例如，江阴一女子，不为清兵所辱，投江而死，袁枚记下了这个事迹，并录了她的两句诗：“寄语路人休掩鼻，活人不及死人香。”又如，在一则诗话中说：“前朝山阴祁忠悯公彪佳，少年美姿容，夫人亦有国色，一时称为金童玉女，后殉国难赴池而死。余游寓山，为公读书之地，遗像犹存，园中竹上或题诗云：‘孤忠愿逐水波清，闻说降幡竖石城。龙种已潜宁惜死，豸冠端坐俨如生。一拳石笋含云气，四负堂开照月明。今日丰碑傍古岸，苔斑犹似旧纵横。’末书‘岳峰’二字，不知何人所作。旁又有无名氏在竹上刻三字云：‘此人通’。”这类记载，应是我们研究袁枚时不可忽视的材料。

《随园诗话》出于清代一位地主阶级文士之手，其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是显而易见的。问题在于如何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由于袁枚坚持了合理的选诗标准和原则，使这部作品包罗万象，加上他水平很高的评论，便具有了文学批评、美学、历史、社会学等等多方面的价值。仅就本文论及的选诗标准和方法来说，也有许多是我们可以借鉴的。它是值得重视的一笔文化遗产，剔除其糟粕是应该的，忽视其中的精华是可惜的，如果揭出其精华而糟粕之，那就过左了。

（上接第69页）

〔32〕《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七；《申谕十家牌法增立保甲》；卷三十二，年谱一。

〔33〕《景宁县志》卷六，武备，保甲条。

〔34〕〔36〕《福宁府志》卷七，塘汛。

〔35〕《处州府志》卷十二，兵制。

〔37〕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言》。

〔38〕〔48〕《处州府志》卷三十，吴楚椿：《畬民考》。

〔39〕《云霄厅志》卷三，瑶僮。

〔40〕《丽水县志》卷十二，风俗。《德化县志》卷三，风俗。

〔41〕《福建通志》卷百四十，国朝宦绩，李殿图条。

〔42〕《处州府志》卷三十，诗篇。

〔43〕《云和县志》卷十五，礼俗。

〔44〕《处州府志》卷二十四，风土。

〔45〕《连江县志》卷三十四，清杂录。

〔46〕《侯官乡土志》卷五，人类。

〔47〕《贵溪县志》卷十四，杂类，轶事。

〔49〕《南平县志》卷十一，礼俗。

〔50〕《建阳县志》卷八，礼俗，余民。

〔51〕福建少数民族调查组：《宁德县南岗畲族调查报告》，1958年。

〔52〕《松阳县志》卷六，风土志，畬民篇。

〔53〕福建少数民族调查组：《霞浦草岗畬族调查报告》，1958年。

〔54〕〔55〕《建阳县志》卷八，礼俗，余民风俗。

〔56〕《罗源县志》卷三十，杂识。

〔57〕《长汀县志》卷三十三，杂识。

〔58〕《德化县志》卷三，风俗。

〔59〕《皇清职贡图》卷三。

〔60〕《列宁全集》第二十卷，《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

〔61〕《列宁全集》第十九卷，《论民族文化自治》。